

石家庄文化通史

—宋—金—元—

卷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hijiazhuang ■

王俊华 贾丽英 / 主编
王慧杰 田 雪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金—元—

卷

王俊华
王慧杰
田雪 /
主编

石家庄文化通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家庄文化通史·宋金元卷 / 王慧杰, 田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203 - 2581 - 3

I. ①石… II. ①王… ②田… III. ①文化史—石家庄—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K292.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214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石家庄文化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高天 王俊华

副主任：王惠周 刘建军 许征程

委员：李忠良 宋艳涛 胡桂林 柳敏和

学术顾问：

孙继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彭建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董存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秦进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振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春长（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主编：王俊华 贾丽英

编委：赵九洲 王慧杰 付金财 袁丙澍 李现红

宋倩 田雪 陈淑荣 王倩 李巧兰

王锋 田建恩 冀平 徐明月 庞鸿志

赵震 刘露露 董怡廷 侯苗 王宇欣

序一

孙继民

王俊华、贾丽英女士主编的《石家庄文化通史》即将出版，借此谈两点自己的感受和认识。

第一，《石家庄文化通史》的编撰反映了河北省学术界在地方史尤其是城市史研究领域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和更深层次的推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地方史研究获得长足进展，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河北古代历史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河北简史》和《河北近代史要》以及 2000 年出版的十卷本《河北通史》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阶段性成果。而作为地方史研究的一部分或者说与地方史研究并列的城市史研究，我省的发轫相较于全国也不算晚，1990 年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邯郸简史》和 1992 年由测绘出版社的《邯郸近代城市史》，不仅属于河北省最早的城市史著作，即使在全国也堪称开风气之先的成果。

石家庄城市史的研究就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言，它在全省既赶不上《邯郸简史》的下手之早，也落在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邢台通史》（上下册）出版之后。但石家庄毕竟是省会所在，拥有近代以来正太铁路与京汉铁路的交汇机缘，即“火车拖来的城市”带来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聚集有一大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文化机构林立带来的文化人才，凭借这一全省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优势，她在 21 世纪之初 2001 年至 2013 年的很短时间内，就形成了城市史著作出版的井喷式的爆发，连续推出了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年出版的《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中华书局 2010 年出版的李惠民博士论文《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推出的《石



家庄通史古代卷》（梁勇主编）、2011 年推出的《石家庄通史近代卷》（石玉新主编）、2013 年推出的《石家庄通史当代卷》（肖力主编）等。短短几年间，石家庄城市史的编著，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涉及问题的深度以及篇幅规模，都跃居全省之首，显示了石家庄市作为省会城市在全省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地位。

诚然，冻冰三尺，非一日之寒。石家庄通史著作的编撰能够在进入 21 世纪后快速推进后来居上，与石家庄市住民对当地历史文化研究的广度和长期积累密切相关。在市情资料积累方面，石家庄当地的各类文化性质的机构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编撰了一系列基础性的资料或专题性的著作，如石家庄市总工会有《石家庄工人运动史》（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石家庄市地名志办公室有《石家庄市地名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石家庄市志》（中国社会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有《石家庄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石家庄市档案馆有《石家庄市大事记（1947—1983）》（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石家庄市城乡建设局的《石家庄市市政建设史略》（1991 年），石家庄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石家庄地区志》（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有《中共石家庄党史人物（第三集）》（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石家庄市民政局有《石家庄市行政区划》（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1 年版），河北省制图院有《石家庄市地图册》（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7 年版），石家庄市档案馆有《石家庄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0 年版）和《石家庄解放档案文献图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年版），石家庄市政协组织编纂的《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21 世纪也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陆续出版。此外，石家庄市政协系统还编纂有系列的文史资料书籍，如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石家庄文史资料》第 1—17 辑，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的《石家庄市郊区文史资料》第 1—3 辑，桥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石家庄市桥西区文史资料》第 1—6 辑，新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石家庄市新华区文史资料》第 1 辑等。还有，与全国性全省性地方志编修同步，石家庄市也在《石家庄市志》之外推出了一系列诸如《石家庄市纺织工业志（1921—1990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石家庄铁路分局志

(1897—1990)》(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南车集团石家庄车辆厂志 (1905—2004)》(2005 年)、《井陉矿务局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4 年版) 等企业志部门志等。这些由各类文化机构编纂的基础性市情资料历史资料，无疑为石家庄城市史的编撰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在史料挖掘和资料积累方面，石家庄当地人士长期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热情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更值得称道。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石家庄市一直有一批潜心于挖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人士，如杨俊科、梁勇、张辰来、栗永、段文等就是其中佼佼者。他们在挖掘、研究、宣传石家庄历史文化方面，或潜心钻研，或摇旗呐喊，不遗余力，甘之如饴，推出了一批紧扣石家庄历史文化主题的研究论著和宣传成果，如杨俊科的《石家庄近代史编年》(方志出版社 2004 年版)，梁勇、杨俊科的《石家庄史志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石家庄地区公路运输史编纂委员会《石家庄地区公路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3 年版)，李耀峰的《石家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 (第 1 辑)》(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栗永的《留住城市的根》(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和《石家庄历史文化百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赵明信的《历史上的石家庄》(方志出版社 2004 年版)，王智的《石话实说：石家庄的 100 个故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等书。这些论著由于发表或出版时间较早，也由于部分作者的单位性质或专业性质所限，其中有的学术规范未必严格，有的学术水平未必整齐，但都收入了不少他们平时留意的资料、探讨的疑难、研究的心得、解决的问题，也都为后来的石家庄城市史的编撰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基础性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体问题研究的论文和其他文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验以至引为鉴戒的教训，汇合成了构筑石家庄城市史巨著的奠基石。

以上对以往石家庄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发展过程的勾勒，固然是着眼于城市史系列著作形成渊源即“来龙”的追溯，但我们更需要在综合性城市史著作撰成之后对石家庄城市史研究今后发展趋势即“去脉”做进一步的展望。笔者认为，《石家庄文化通史》的出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这一趋势的大致方向。《石家庄文化通史》与《石家庄通史》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专门性通史，后者是综合性通史。综史的优势是



领域宽广、包罗万象、内容丰富，专史的优势是领域专狭、问题集中、内容深入。专史与综史在初级阶段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专史是构成综史的基础，综史是融汇专史的集成，所以就时间顺序而言，应是先有专史后有综史。但是就综史与专史在高级阶段的逻辑关系而言，综史又是专史进一步深入的整体关照，专史则又是综史整体框架内专门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所以在高级阶段的时间顺序应是综史在先专史在后。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驻石家庄市各机构各人士对本市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形成的各种资料各种论著，可以视为构成石家庄城市综合性通史著作的前身和专史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家庄文化通史》则应视为石家庄城市专门性通史在更高阶段对综合性通史《石家庄通史》在文化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家庄文化通史》的编撰反映了河北省学术界在地方史尤其是城市史研究领域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和更深层次的推进，也预示了石家庄新一轮城市史其他专门领域迈向更高级阶段的新方向。

第二，《石家庄文化通史》的出版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市属高校使命回归的学术意义和研究选题更接地气的实践意义。

《石家庄文化通史》的撰写人是以石家庄学院的一批教师为主体，这无论对石家庄市还是对石家庄学院来说都是一个可喜的文化现象。与地方志编纂的空间限定“书不越境”不同，学术研究对象的划分原本并无强制性的空间限定，即所谓“研究无禁区”。不过，这并不妨碍各层级各系统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领域划分，所谓“领域有分工”。作为省会城市，石家庄驻有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但这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却由于层级和隶属关系的不同，在参与地方历史研究方面却有着不同的面向和重点。省社科院和省级文化单位以及河北师范大学等省属重点高校，面向的重点是省级层面的课题和问题，市社科院以及市级文化单位面向的重点是市级层面的课题和问题。这也是河北省历史类的论著多由省社科院承担，燕赵文化类论著多由河北师范大学等省属高校承担，石家庄市历史类论著多由市级单位或人士承担的缘故。按照一般理解，市属高校的石家庄学院，面向的重点应该包括当地的历史文化的研究，但实际情况却不然。我们从以上简述中可以发现，在既有的石家庄市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中很难见到石家庄学院作者的身影。一个本

应重点面向本地的高校却在本地历史文化研究中长期缺位，这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绝非上策。“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石家庄学院老师这次主动承担起《石家庄文化通史》的主撰任务，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从游离其外到参与其中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石家庄住民和市属高校肩负文化使命的主体自觉，这尤其值得肯定与赞赏。

2018年7月

序二

杨振红

人类进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对世界的好奇。好奇的目光投诸三个方向：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方向，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所有学科的构成。“过去”形成了“现在”和“未来”的基因，决定了今天的面貌，并在相当程度上规定和影响着未来的模样。这一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概莫能外。我们这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常常会被人追问你们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对于仅仅关心有形的物质和目下功名的人，历史学好像确实没什么实际用处。然而，作为有思想、有情感的万物之灵，怎么可以对自己的过去蒙昧无知、漠不关心？又怎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过去的情况下，过好当下，并有一个令人无限期待的未来？

地区史或区域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是我们了解过去不可或缺的视角，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上古时代，文明之花灿若满天星斗，开遍中华大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此后，中国便长期以一个统一共同体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统治者虽然一贯强调“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主张整齐风俗，但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历程，仍造就、形成各地不同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因此，要整体地深入地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地区史和区域史研究基础之上。

石家庄市在中国省会城市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20世纪初叶，它还是获鹿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下一个普普通通的不起眼的村庄，但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其四通八达的交通要衢地位才使其价值陡然提升，从而迅速取代县城地位，成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之



一，并在1968年正式成为河北省省会。虽然石家庄的城市历史只有百余年，作为省会城市也只有五十年的时间，但其所辖之地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现在的石家庄市横跨太行山脉和滹沱河冲击平原两大区域，兼有《禹贡》并、冀两州之地，传说帝尧曾以此为都，战国时为赵、中山之地。自古以来以民风彪悍、“好气任侠”“悲歌慷慨”闻名，风俗独特，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4年，石家庄学院本着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情怀和宗旨，确定了编纂五卷本《石家庄文化通史》作为石家庄学院历史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并通过河北省科学发展研究重大课题立项。学院组织了以王俊华、贾丽英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肩负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此套通史以思想、精神风尚、民俗、文学艺术等串线，对今石家庄市区域内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由于石家庄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一座新兴城市，因此，客观上造成以石家庄为对象的区域通史研究，相较那些历史名城，在历史区域范畴的确定、材料的使用等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难。但团队不负众望，经过数年努力，各卷陆续完成，即将付梓。虽然由于时间等原因，目前呈现的成果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缺憾，但作为第一部石家庄文化通史，它显然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与石家庄结缘，缘于贾丽英教授。贾丽英教授曾在我过去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过两年，其间结下了深厚情谊。此次受贾教授之托，为这样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石家庄文化通史》撰写序言，惶恐之余，也倍感荣幸。在此谨对此套通史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

2018年6月

前　　言

《石家庄文化通史》按时代分作《先秦秦汉卷》《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共五卷本，约二百万字。研究对象分期上自远古，下迄石家庄解放（1947年11月），是一个大型的学术工程。这部通史是石家庄学院历史学重点建设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凝结了我校及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同仁的心血，饱含着我们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学术热情。与其说通史的写作，完成了一项学术任务，不如说通史的完成，圆了我校史学同仁为石家庄区域文化贡献微薄之力的一个梦想。

“文化”这个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① 后来晋代束晰《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② 都是将“文化”与没有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应，其本义与《周易》中提到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③ 意义一致。

如今，与文化领域中的许多概念一样，“文化”一词本身的含义就充满歧义。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④。而凡是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思想的、认识的、艺术的、社会的、器用的等众多领域的物质和精神的业绩，在这个概念中都可以叫作文化。上海书店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的，由郑振铎、郭箴一、白寿彝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就包括了中国

①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十五《指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0页。

② （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5页。

③ （宋）朱熹撰：《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页。

④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学灯》1922年12月9日。



政治思想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文字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渔业史、中国水利史、中国医学史、中国算学史、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国救荒史等几十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全套 50 种。这种认知应是我们所说的“大文化”。

“小文化”则是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1871 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①。事实上，泰勒的文化概念与中国传统语言系统中的“以文教化”的意义是相似的，都属于“小文化”的范畴。

我们写作伊始，也就文化史的定义展开充分的讨论，最终确定以“小文化”为研究对象。各分卷需在内容上都涵盖“小文化”中的主流思潮与信仰、文学与艺术、社会习俗与风尚。但是《石家庄文化通史》研究对象从远古，至王国、帝国时期，再至近代社会，历史亘古绵长。每一个时段，尤其是长时段，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风貌。因此我们又强调共性中的个性存在，即“求大同，存小异”。比如说因南水北调工程主要集中在元氏故城，数百座汉墓被集中挖掘，我们在第一卷专门设置“汉墓考古文化”一章。再比如说赵郡李氏，世家家世维系纵贯魏晋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对中古社会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在第二卷中设置“中古时期的世族与世族文化”来探讨赵郡李氏、无极甄氏与土门崔氏等主要世族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家学渊源等。总之，通史强调文化中的共性，凸显个性，通过对不同的文化现象的分析，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探求石家庄历史文化的精神。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区域史和区域文化的研究成为国内史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地方文化的客观需求。《石家庄文化通史》也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构思、规划并完成的。

但是，区域史和区域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地方史和地方文化，更不等同于地方志。地方志一般强调的“越境不书”，对于现行行政区划外的事物不会涉及。地方史则多以现行行政区划来划分。而区域史学所强调

^① [英] 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的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以整体或单一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为标准来探讨一个特定空间的历史进程或历史发展共性特征。^①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弗尔、布罗代尔、埃马纽埃尔等都是区域史学研究的早期代表。布罗代尔区域史经典之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将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历史在这里就成为特定时空点上的一个坐标。埃马纽埃尔《蒙塔尤》则是把时空锁定在 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一个山村，再现了六百年前蒙塔尤的自然生态、宗教信仰、社会民俗等历史面貌。^② 这都是“整体”区域史的代表之作。

区域文化史，是以单一要素为标准的。它不同于区域整体史，也不同于区域经济史或区域社会史。它所侧重的应该是“宗教、习俗、语言等文化表象的同一性”^③。

本套书是以现行行政区划为标准来划分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作区域史学，只能叫作区域性史学。但是，《石家庄文化通史》全书共分五卷，分不同的时段来讨论问题。比如先秦的中山国文化，汉代的常山文化，唐代的恒州文化、赵州文化，明清的真定府文化等本身都是对一个特定时段、特定空间文化现象的探讨，其文化现象之间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和系统性，都属于较为典型的区域史学。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注意运用了区域史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比如先秦时期依托中山国遗址、中山王墓等考古资料重点探讨了中山国文化现象和文化风貌；汉代的常山国、常山郡，则依托南水北调考古工程的丰硕成果，对两汉常山一带的信仰、习俗、生活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宋金时期真定府，依

① 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认为区域史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认为“区域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特征和系统性的区域历史，进而揭示区域历史发展系统性、独特性的史学分支学科”。笔者倾向于徐国利先生说。

② [法]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③ 张利民：《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托现存正定隆兴寺、佛教石窟摩崖造像和碑刻，对宋金时期宗教和民间信仰进行着重探讨。

现石家庄辖区，区域范围小，史料收集相对困难。越是时代久远，史料不足的问题越严重。因此在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充分利用文献材料，将各代地方志、正史、类书、政书、地理书、字书，甚至笔记小说、诗文等都纳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高度重视考古学资料。碑刻、简牍，以及考古发掘资料，都是各分卷写作中高度关注的。我们不敢说穷尽了所有的考古材料，但主要的碑刻、墓志、壁画、墓葬等内容，都网罗其中。

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史，必然涉及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人。而生活在这一区域，并对这一区域的社会生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类人，一个是原住民，一个是外籍人。因此对于重要人物的文化活动，我们采用的原则：一是“以地系人”。是指那些籍贯在本地的杰出人士，即使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本地，也纳入研究范围。如宋代真定灵寿人韩亿家族，自韩亿开始以科举起家，其子韩缜、韩绎和韩维，都曾经做过宰执。在学术上，韩维和韩绎两兄弟直接受教于程颐、程颢。因此韩亿家族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二是“以事系人”。是指那些在本地为官、传道、游历的重要人物。比如汉代常山太傅韩婴，本为燕地人。但在任常山太傅时期对于常山经学、易学、韩诗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探究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学成就时，对韩婴的突出贡献多有叙及。

区域文化的研究，除了关注同一区域文化的同质性、系统性之外，还需要关注超越区域的问题，尤其是当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小之时。在《石家庄文化通史》的写作中，我们特别注意两种关系。其一，研究本区域与邻近地区的同质关系。比如汉代距今时代久远，资料稀少。但邻近的河北保定满城，中山国刘胜及夫人墓材料丰富，而事实上在两汉时期中山国也曾辖新市（治所正定新城铺）、毋极（治所无极西南新城村）、深泽（治所深泽县城）三县，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就采用了汉时中山国相当数量的资料；再比如中古博陵崔氏的材料很丰富，而由其分化出来的土门崔氏和平山崔氏的相关材料并不是特别丰富，那么我们较多地运用了博陵崔氏相关材料来探究土门崔氏和

平山崔氏的大致风貌。其二，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统一关系。区域文化的独特性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因材料的稀疏以及时代的特点，我们也采用从主流文化视角来阐释石家庄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比如西汉中期以后，大一统主流汉文化对原该地赵文化的冲击和同化严重，因此研究常山一带服饰饮食、墓葬风俗，就适当采用关中地区的材料加以补充说明。两宋时期虽没有达到地域上的统一，然而宋统治地区仍是文化中心，辽金少数民族仰慕中原文化，真定府也是中原文化北渐的通道，因此研究该地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和岁时节日习俗也适当采用当时京畿周围材料加以说明。

作为一个大型的学术工程，如同其他多卷本著述一样，我们从写作伊始至今，多次召开调度会，分别就选题的确定、大纲的构思、写作的规范、实地考察的地点、人员的调整、写作的进程等进行讨论、协调。虽然课题组的老师们各尽其力，但毕竟作者较多，编写的时间又很仓促，故不仅在具体问题上，恐在整体结构上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石家庄文化通史》是在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在此谨表谢忱！感谢河北省社科联、河北省历史学会给予的大力支持！

石家庄学院教学任务较重，《石家庄文化通史》课题组的部分老师还承担着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河北省社科规划项目等研究任务，为了完成这部集体著作，各位作者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全力以赴，才使这个大型学术工程得以如期完成，感谢大家！

河北省文物局韩立森副局长、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春长主任、河北省博物院张慧研究员为丛书提供了封面照片，感谢他们的热情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纹副总编、责任编辑安芳老师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很多工作，真诚地感谢她们！

王俊华 贾丽英

2017年12月

目 录

绪论	(1)
一 宋元真定府赵州区域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	(1)
二 宋元真定府赵州文化研究现状	(28)
第一章 北宋真定府赵州的儒学	(32)
一 北宋真定府赵州儒学的状况	(32)
二 真定府赵州诸儒的从政实践	(39)
第二章 金元之际真定府赵州文化整合	(59)
一 金代女真文化与真定府赵州文化的冲撞	(59)
二 蒙古进占真定府与史氏家族的兴学养士	(67)
三 史天泽幕府中儒士为政思想与政治实践	(71)
四 真定世侯的兴灭与元朝对真定的政治文化统治	(75)
第三章 宋元真定府赵州的宗教	(91)
一 宋元真定府赵州佛教	(91)
二 宋元真定府赵州道教	(105)
三 宋元真定府的民间秘密宗教	(109)
第四章 宋元真定府赵州的文学	(113)
一 北宋真定府赵州的诗词创作	(114)
二 北宋真定府赵州散文创作	(126)
三 金代真定的文学	(130)